

达尔文怎么治好拖延症的



本报记者 王昱

一周史记

下周史上那点事儿
(11月23日—11月29日)

拖延症大约是时下流毒最广的心理疾病之一,无数大好青年在这种病症的折磨下“明日复明日”。当然,这个病不是今天才有的,历史上就曾经有位爷,将本来已经呼之欲出的书整整拖了20年才动笔,堪称“拖延症之王”,而且这人和他的书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至关重要,这就是达尔文和他的《物种起源》。

1859年11月24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第一次印行出版并迅速被抢购一空,“进化论”的概念震动了整个世界。我们今天在谈起达尔文写作该书时,往往喜欢

这么说:“达尔文在随贝格尔号军舰环球考察时,通过对各地不同物种的观察,萌发了‘进化论’的思想,并创作了《物种起源》。”这样的叙事让《物种起源》的产生听起来相当“顺滑”,好像达尔文下船后就笔耕不辍,把这本书写出来了。不过,如果拿达尔文生平时间表一对,会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达尔文乘贝格尔号环游世界是1831年至1836年,而他出版《物种起源》却到了1859年,中间隔了20多年。

拖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达尔文一直没灵感吗?也不是,有确切的资料表明,达尔文最迟在1840年就已经为《物种起源》打好了腹稿。然而此后近20年里,他娶了媳妇、买了房、养了病、生了孩子,还写了好几本关于地质学和农学的书籍,但放着那部在脑中已经成形的《物种起源》,就是不下笔。中国人民两次鸦片战争都

打完了,达尔文却还那么拖着,真是活脱脱一个拖延症患者。

达尔文为何总拖着不写?是因为他心理压力实在巨大。很多人认为他提出“进化论”仅仅是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其实,按照达尔文理论,物种的突变完全随机,哪一种突变能够生存完全取决于环境,而环境的变化是没有方向的,因此这个理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生物进化其实没有所谓的方向可言。按照这套理论,你甚至不能说人类比细菌更成功,因为细菌对环境的适应其实比人类强得多。

这种理论太惊世骇俗了。因此在这20年中,达尔文一直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把这个令他自己也感到害怕的理论放出笼来。这就是达尔文罹患拖延症的秘密。

那么,拖延症晚期患者达尔文为何最终又治好了这病呢?原因是来自后辈的“压力”。1858年,

达尔文收到一个名叫华莱士的青年写给他的一封信,随信附着一篇文章。华莱士是一个生物地理学家,当时正在马来群岛考察。华莱士在信中兴奋地告诉达尔文,他“突然想到了一种伟大的理论”,想请前辈达尔文帮他审稿,如果达尔文认为有价值,烦请点个赞——帮他推荐给著名学者赖尔。达尔文一看随信附上的文稿,心就凉了一大截,因为华莱士所说的“伟大理论”其实就是自己酝酿中的进化论,文稿中很多用语甚至和他构思中的那本书想的一样。

虽然达尔文一直纠结于“进化论”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但他深知提出这个理论的人将名垂青史。如今一个后辈眼看就将摘走自己等了20年的理论成果,可以想象他有多么不甘。但身为英国绅士,达尔文体现出了高贵的人格,他立即将华莱士的论文按其要求转给赖尔,并建议发表。

那意思是宁愿压下自己的研究成果,让华莱士独享殊荣。幸好,赖尔作为达尔文多年的老朋友,对他的理论知根知底,因此力劝达尔文跟华莱士进行协调。最终,华莱士的那篇论文和达尔文手稿的部分摘录一起在1858年发表,两人算是共享了提出“进化论”的殊荣。经历这场风波之后,达尔文才深知此事不能再拖,他把准备多年的手稿压缩到三分之一左右,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写出了《物种起源》,前后速度相差如此之大,令人咋舌。

达尔文与华莱士共享甚至互相推让“进化论”发现权的故事,当然是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不过,从这个故事里我们也能咂摸出点别的滋味:如果你抱着一个令自己激动不已的想法,最好不要纠结畏惧,现在就付诸行动,用马云的话说——“万一实现了呢?”

本报记者 王昱

起源: 努力卖萌,求你别砍

写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学者戴蒙德在他的书中曾经记载过几内亚群岛上一个有趣的民俗,在几内亚的原始部落里,人们如果遇见其他部落的陌生人,往往会比碰见熟人还亲热,双方会玩命地唠嗑、攀亲戚。戴蒙德解释说,几内亚人在唠嗑时其实是很紧张的,他们要通过这一方式确定对方与自己到底存在多少“共性”、有没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所以这种唠嗑本质上讲是为了“说服自己不杀掉对方”。

见到生人特亲热,努力建立共性,这恐怕是人类自原始部落以来一直没改掉的本能。基于这一理论,建立共性最好的方式莫过于送礼,而各种“萌物”无疑是最好的礼品之一。

大人物间最早的一次互赠动物,可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时代。这位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大帝国的牛人据说很喜欢动物,打到哪里都要划拉一批当地的奇兽。他在临死前将这批心爱的动物打包送给了部将托勒密,后者在埃及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帝国,还用这批动物建造了人类第一座动物园“亚历山大动物园”。

时光荏苒,一百多年后,“亚历山大动物园”的萌物们落到了另一个大牛人凯撒手中,凯撒此时远征埃及,在把埃及艳后留给自己享用后,他决定将动物装船运往罗马,送给元老院和人民当礼品。捎带提一句,凯撒跟元老院此时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点即炸的程度,此次送动物之举,其实就有点“萌物外交”的意思。令人遗憾的是,元老院显然没有被凯撒送来的动物萌到,凯撒回罗马后不久,就被他们干掉了。

发展: 以子长颈鹿,易我北极熊

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历史进入一团乱斗的中世纪前期,兵荒马乱之际,自然没人有心思互送动物。不过战乱一旦平息,人类的爱萌之心又起。

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出了位著名的爱动物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据说此公非常想要一只长颈鹿,于是他就去跟远在非洲的埃及苏丹打商量。埃及苏丹正好很想看看北极熊长啥样,于是双方最终商定的结果是平等互换——弗雷德里克二世专门派人去北欧给苏丹抓了一只北极熊来,这才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长颈鹿——要知道当时基督教跟伊伊斯兰教还打着宗教战争呢,双方竟然能“化干戈为萌物”,可谓人



G20峰会期间,阿博特(左)和普京与考拉合影。

贯穿“萌物外交”进化史的主旋律: 多卖萌 少掐架

在刚刚闭幕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上,东道国澳大利亚出人意料地发起了“考拉外交”,“呆萌”的考拉萌翻了场内的领导人和场外的观众。当然,也有看客对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各抱一只考拉合影很是不满——不是说好见面要“单挑”吗,咋合伙卖起萌来了?

在领导人云集的会议上,“呆萌”的考拉竟然能喧宾夺主,此事本身就很“萌”。纵观历史,使用各种可爱的动物将严肃的外交“萌化”,这个努力其实人类一直没有放弃过。“多卖萌,少掐架”的主旋律贯穿了整个“萌物外交”进化史。

类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也许是受弗雷德里克二世的影响,神圣罗马帝国一贯有重视动物礼品的传统,而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又特别善于嫁女儿,国王女婿遍及全欧洲。所以姑爷们来探亲时,总会捎几只动物来,天长日久,也攒下了不少动物。1757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弗兰西斯一世送给他的妻子——皇后玛丽娅·特利萨一座动物园作为礼物,这就是人类第一座现代意义的动物园“美泉宫动物园”,这座动物园一直存续至今。

现状: 关系越微妙,卖萌越使劲

穿越了中世纪贵族阶级互送宠物的幼齿时代,“萌物外交”终于发展到了现代。与贵族

老爷们互送宠物单纯为了“图个乐”不同,眼下国与国之间互送动物之举,往往“醉翁之意不在萌”,而是为了借此撬动两国关系。

提到现代意义上的“萌物外交”,最为著名的大约当数我国的“大熊猫外交”,在从1957年到1982年的26年间,中国一共赠送给9个国家23只大熊猫。其中最著名的两次赠送要数1972年中国分别赠送给美国和日本一对熊猫。熊猫到访美日在当时之所以能引起轰动,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本身的“萌属性”,更是由于它们是中国打开国门,向西方伸出橄榄枝的一个象征。

正如中国人对熊猫的感情,不同国家对于选择什么动物做国礼“最萌”有着不同的理解。大象在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经常被作为国

礼送出。1953年6月,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通过越中友好协会赠送给毛主席一对亚洲象,雄性“阿吐”,雌性“阿邦”,以纪念中方对“奠边府战役”的支援。在中亚地区,骏马则是最高档次的国礼,今年5月12日,土库曼斯坦赠予中国一匹汗血宝马。

不过,在各国间送来送去的各种“萌物”中,戏份最重的其实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狗。冷战时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缓和苏美关系,曾送给美国总统肯尼迪一条名叫“绒毛”的狗。虽然小狗很可爱,但肯尼迪很长一段时间没敢跟它玩,美国特工人员给狗检查了半天,以防其身上有窃听器或定时炸弹。

类似微妙的情节,最近也不时发生。2012年7月,安倍访问俄罗斯时,将一只名为“梦”的秋田

犬送给普京,感谢俄方在日本地震和海啸灾难后的救援。今年,索契冬奥会期间,普京带着秋田犬与安倍会面,安倍和普京在一起逗狗时,据说还用俄语客气了两句:安倍说“好狗”,普京说“是的,但有时也会咬人”。不久,日本加入制裁俄罗斯的阵营,俄方开始频繁地派轰炸机在日本周边转悠。

国家之间互送“萌物”,其中的学问如今已经高深得让人有些看不懂。比如此次G20峰会期间,很多人就对阿博特和普京各抱一只考拉呵呵合影很是不满,因为阿博特之前可是放言要跟普京玩摔跤的。

看来,国家的“萌物外交”,其原理相比几千年前的部落时代没发生太大变化——互相之间卖卖萌,总比掐个你死我活好多。